

Salerno, J. T. (1999). The place of Mises's human a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2(1), 35-65.

熊越 译

本文仅供研究使用，不一定代表译者观点

米塞斯《人的行动》在现代经济思想发展中的位置

约瑟夫·T. 萨勒诺 (Joseph T. Salerno) *

任何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都是对如何确定价格的解释。正如 Mises (1998, 235) 自己所说，“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对市场上交换的商品和服务的货币价格决定的分析。”因此，《人的行动》的核心是第三和第四部分（201–684），标题分别为“经济计算”和“市场社会的交换学或经济学”。这两部分共 484 页，首次提出了关于如何确定实际市场价格的完整而系统的理论。当然，米塞斯并不是凭空创造出这个理论。事实上，《人的行动》中阐述的价格理论代表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最高成就。它是由卡尔·门格尔 (Carl Menger) 于 1871 年提出——并由介于门格尔和米塞斯之间的几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的价格理论方法的顶峰。后者尤其包括欧根·冯·庞巴维克 (Eugen von Böhm-Bawerk)、J. B. 克拉克 (J. B. Clark)、菲利普·H. 威克斯蒂德 (Phillip H. Wicksteed)、弗兰克·A. 费特 (Frank A. Fetter) 和赫伯特·J. 达文波特 (Herbert J. Davenport)。不幸的是，由于下面将要解释的原因，整个门格尔方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衰落，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几乎完全休眠。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的杰出贡献是单枪匹马地复兴了这种方法，并将其阐述为一个连贯而系统的价格决定理论。

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 1 节描述了门格尔方法的价格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此时它已达到其国际影响力的顶峰）的发展。第 2 节描述了它惊人的迅速衰落，并提出了四个原因，包括前两代门格尔主义者尚未解决的两个基本理论问题。米塞斯为恢复这种方法而进行的单独斗争，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到 1949 年《人的行动》的出版达到高潮，这是第 3 节的主题。本节还提出了一个修正主义论点，对传统观点——奥地利经济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风靡一时，却突然被“凯恩斯雪崩”悲惨地埋葬——提出了异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门格尔主义传统

要理解米塞斯贡献的全部意义，有必要广泛回顾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初期到 20 世纪 30 年代纯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从 19 世纪 70 年代的边际革命中出现

* 约瑟夫·T. 萨勒诺是佩斯大学鲁宾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我要感谢纽约大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座谈会的成员，特别是 Israel Kirzner、Roger Koppl、Frederic Sautet、David Harper 和 William Butos。他们对本文初稿的探索性评论促使我进行修改，我相信这些修改已经显著改进了最终产品。我还要感谢 Robert Batemarco、Hans-Hermann Hoppe、Jeffrey Herbener 和 Frank Shostak 阅读了手稿并提供了宝贵的批评和建议。这些致谢并不意味着这些个人中的任何一位都必须认可本文的结论或对仍然存在的错误承担任何责任。

了三种不同的价格理论方法。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试图用天文学和经典力学来解释价格形成，明确地将“市场状态视为由方程组描述的静态均衡的一般问题”（Ingrao and Israel 1990, 92）。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方法虽然公认是系统的，但它是没有时间的和机械的，因此无法产生关于现实世界定价过程的理论，即历史市场过程所产生的实际的（和必然非均衡的）货币价格的理论。相比之下，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设计的部分均衡方法涉及一种错误的尝试来确保经济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即回避分析消费者选择方面的价格和成本现象的最终原因，反而接受古典经济学家对商人的肤浅关注。这种方法远非确保更大的现实主义，而是导致孤立地分析单个价格的确定，这忽略或淡化了现实世界经济中所有价值和价格之间普遍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

门格尔的方法与瓦尔拉斯和马歇尔的方法截然不同。它既是系统的又是现实的。正如他在《原则》前言中大胆宣布的那样，

我尤为注意研究涉及产品和相应中间品的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不只是为了在现实的基础上，在一个统一的视角下，建立一个涵盖一切价格现象（包括利息、工资、地租等）的价格理论；还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进而获得对许多其他经济过程的重要洞见，而迄今为止它们完全被人误解了。（Menger 1981, 49）

与他追求包罗万象、基于现实的价格理论相一致，门格尔试图解释“实际交换的商品数量”（191）。因此，他将他的解释集中在瞬时交换均衡（momentary exchange equilibria），或他所谓的“静止点（points of rest）”上，这与历史市场价格的出现相吻合（188）。虽然门格尔因此回避了机械的一般均衡分析，因为它无法对实际价格的决定做出因果解释，但他并没有不提出对定价过程的系统解释。因此，他的论文一开始就承认“所有事物都受制于因果法则”（51）。而对于门格尔来说，所有价值和价格现象的真正和最终原因是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即普遍存在的人为了需求满足而努力。这种努力的对象是外部世界的稀缺元素——它们被认为是需求满足的原因；即经济财货。此外，由于行动者必须评估满足各种具体需求或需要的相对重要性，所有经济财货在门格尔所称的“财货的因果关系”中相互关联，作为补充、替代品、投入或产品（56）。因此，价值和价格的整个组合是个人评价和选择的相互作用的系统和相互依存的结果。¹

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门格尔的第一批追随者（庞巴维克和他的朋友兼姐夫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开始出版著作，并且，随着这十年的进展，他们和在奥地利和其他地方受门格尔影响的其他人的出版物越来越多，逐渐从溪水汇聚成了洪流。因此，到本世纪末，一个可识别的“奥地利学派”已经合并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个早期阶段，奥地利学派在基本理论的一个关键问题上也存在严重分歧。一方面，庞巴维克充分吸收了门格尔对价格理论的因果-现实主义（causal-realistic）方法，并努力进一步发展并将其应用到新的领域。另一方面，维塞尔狭隘地抓住了体现在边际效用

¹ 关于对门格尔的价值和价格理论的解释，即它强调因果律的中心性，参见 Salerno (1999)。

原则中的门格尔的“主观主义”，虽然有用地阐述了这一原则的一些含义，但完全忽略了门格尔努力在它之上建立的基于现实的价格理论的结构。维塞尔的目的是在他称之为“自然价值”的一般均衡状态的基础上构建他自己独特的社会福利理想，并通过边际效用的概念将其与人类心理学的基础联系起来。²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门格尔最早和最杰出的门徒之间的这种分裂对后来奥地利学派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 1884 年到 1914 年的三十年中，奥地利学派蓬勃发展，在将门格尔主义方法发展为完整的价格理论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一进步尤其体现在庞巴维克、³英国的 Wicksteed (1967) 和美国的所谓“美国心理学派”⁴的核心成员 Clark (1965)、Fetter (1915) 和 Davenport (1968) 的著作中。门格尔主义价格理论影响的顶峰恰逢威克斯蒂德、达文波特和费特分别于 1910 年、1913 年和 1915 年发表论文。事实上，正如哈耶克多年后所说的那样，“在战后初期的维也纳，相比（也许除瑞典人之外的）其他外国经济学家的作品，我们更熟悉美国理论家约翰·贝茨·克拉克、托马斯·尼克松·卡佛、欧文·费雪、弗兰克·费特和赫伯特·约瑟夫·达文波特的。”⁵

门格尔主义传统的衰落

不幸的是，奥地利学派及其因果-现实主义方法从其国际影响力的顶峰迅速衰落。这种衰落有四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原因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年在维也纳发生的各种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庞巴维克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过早枯萎——以他在 1914 年的英年早逝告终——和约瑟夫·A. 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创造力和智识影响力的同时繁盛。⁶第二是马歇尔主义经济学在英语国家的迅速崛起，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在纯理论领域几乎完全占据主导地位。破坏门格尔主义理论方法的第三个因素是 1931 年弗里德里希·A. 哈耶克的到来，极大地刺激了伦敦政经学院的大陆一般均衡分析研究。最后，门格尔

² 在他的第一本书中，维塞尔将经济理论描述为“应用心理学”。尽管他最终拒绝了这一名称，但他继续坚持认为，经济调查始于“经济关系的实践意识”，这是外行和理论家的共同财产（Wieser 1967, 3–4）。关于维塞尔经济学中心理因素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 Kauder (1965, 120–23)。关于维塞尔的“自然价值”概念，参见 Wieser (1971, 60–64) 和 Howey (1989, 151–52)。

³ 参见 Böhm-Bawerk (1886, 1–82, 477–541)。这篇从未译成英文的长篇期刊文章实际上是一本关于价值和价格理论的专著，其中大部分——但绝不是全部——被纳入了他三年后出版的德文版《资本实证论》。见同上（1959, vol. 2, 121–56）。

⁴ “美国心理学派”一词是费特创造的，用来指代他自己的学说。它旨在强调废除边沁享乐主义的最后遗迹，以支持将意志心理学作为门格尔主义价值理论的基础（Dorfman 1969, 361–62, 385）。

⁵ 参见 Hayek (1992, 32)。令人费解的是，哈耶克将这一发展主要归因于熊彼特 1913 年在哈佛大学担任奥地利交换教授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情况。更有可能的是，是庞巴维克早在 1913 年之前就将他的奥地利同事和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这些美国思想家身上，因为他在美国期刊上与他们的多次交流表明他对他们的作品的熟悉和尊重。这种解释与米塞斯的陈述是一致的，即“我知道我对【美国】经济学家有多少亏欠，尤其是从多年前，当我的老师庞巴维克将我的注意力转向研究约翰·贝茨·克拉克、弗兰克·A. 费特和其他美国学者的著作之后”（Mises 1980, 224）。

⁶ 我要感谢 Jörg Guido Hülsmann 提醒我熊彼特在奥地利学派早期发展中的关键但迄今为止被忽视的作用。

主义方法本身，即使在威克斯蒂德、费特和达文波特的著作里最复杂的阐述中，也包含重要的缺陷，这些缺陷导致了人们普遍认为它只不过是对一般均衡分析提供了不那么严格的口头表达。以下四个小节将依次讨论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

庞巴维克的衰落和熊彼特的崛起

随着 1886 年其专著《财货经济价值理论基础》（*Grundzüge der Theorie des wirtschaftlichen Güterwerthes*）的出版——重申和扩展了门格尔主义价值和价格理论的原理⁷——庞巴维克获得了国际声誉。在 1889 年他的权威论文《资本与利息》（*Capital and Interest*, 1959）第二卷的出版以及它几乎立即引发的长期争论之后，庞巴维克从门格尔手中接过了奥地利学派的领导权。除了分别于 1888 年和 1892 年发表的两篇关于资本和货币的精彩文章之外，⁸后者自 19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对经济理论没有任何实质性贡献，他的《原理》到那时早已绝版，而且极难获得。

早在 1914 年 63 岁的庞巴维克去世之前，奥地利的事态已经开始对门格尔的方法产生不利影响。1889 年，庞巴维克进入政府服务部门，并在那里工作了 15 年。尽管这些年他密切关注迅速发展的文献并继续出版，但他作为高级公务员的职责使他几乎没有时间进行学术活动。到 1905 年，当庞巴维克在维也纳大学担任特别设立的教席并重返全日制学术追求时，他的身份已经是一位可敬的资深政治家，无法从对其时间和精力的持续非学术需求中完全抽身。此外，他还自然地赋予了经济学界中政治家的角色，他在奥地利经济协会委员会任职多年，也在 1907 年和 1911 年分别当选了奥地利科学院的副主席和主席。除了这些对他时间的大量需求之外，他大力更新自己的科学研究的能力也受到了前十五年巨大的工作量和对其健康造成的沉重打击的阻碍。因此，在他 54 岁重返学术生涯时，他“似乎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两年后，他称自己为“老人”。⁹

与此同时，在庞巴维克的学术生涯逐步中断的期间，门格尔于 1902 年从维也纳大学退休，次年维塞尔接任教席。维塞尔是一个散漫而独特的思想家，如上所述，他倾向于遵循瓦尔拉斯主义的一般均衡方法来处理价格理论。尽管他的主要学说影响无可否认地是门格尔，但他当然不能——在与庞巴维克或甚至威克斯蒂德和费特相同的意义上——被归类为门格尔主义价格理论家。正如他在大学里的学生熊彼特所写的那样：

⁷ Hennings (1997, 12) 承认了庞巴维克的《基础》的理论意义：

庞巴维克关于价值理论的专著，……在最受尊敬的德语期刊上出版，很快就被公认为对该团体一些核心观点的精彩陈述，尤其是当时门格尔的《原理》极难获得。

Hayek (1992, vol. 4, 112) 提到了“庞巴维克的精彩阐述”，其中他“给出了新学说的最完整版本，包括成本法则，以及该学说普及的形式。”

⁸ 关于货币的论文已被翻译成英文。参见 Zlabinger (1977)。

⁹ 本段基于 Hennings (1997, 12–17)。米塞斯在 1905 年至 1913 年间定期参加了庞巴维克在大学举办的著名研讨班，他观察到，在此期间，“如果条件允许，庞巴维克本可以产出更多。……但他的体质再也无法承受从事伟大事业所必需的艰苦工作——他的神经已经让他失望了。两个小时的研讨班已经消耗了他的体力”（Mises 1978, 41）。

任何深入到维塞尔知识世界的专业同事都会立即意识到一种新的氛围。就好像一个人走进了一座与其他人所知道的房子完全不同的房子，其组织和家具与我们的时代格格不入，起初令人不安。……很少有作者像维塞尔这样不怎么亏欠其他作者的。归根结底，他唯一的亏欠是对门格尔，而他亏欠门格尔的只是最初的推动力。……当他创作自己的作品时，他以至高无上的冷静抛开其他专家写的东西。……他的阅读速度既不快也不广泛，也很少试图抓住他人智识系统的精妙之处。¹⁰

与熊彼特相比，米塞斯对维塞尔的智力和成就的热情要少得多，但他也认为维塞尔的工作除了最初的灵感之外，并没有太多归功于门格尔。米塞斯承认维塞尔“立即”认识到门格尔工作的重要性并“在某些方面丰富了思想”，但米塞斯否认维塞尔是一位“创造性的思想家”，并认为他通常“弊大于利”。事实上，根据米塞斯的说法，维塞尔

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思想的要旨，这种局限使他犯了许多不幸的错误。……他的价值计算思想证明了他不能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的成员，而是洛桑学派的成员。（Mises 1978, 36）

关于后一点，乔治·斯蒂格勒的判断与米塞斯的一致。Stigler (1949, 158) 指出，维塞尔的归属理论“相比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著作，与瓦尔拉斯的早期著作更密切相关”。

熊彼特于 1901 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并于 1903 年开始在维塞尔——当时刚刚继任门格尔之前的教席——的指导下学习经济学。这两个人作为师生的命运般的相遇，标志着门格尔主义的价格理论方法在奥地利本身的垮台的开始。熊彼特受到维塞尔的“深刻影响”，“他们在经济理论的许多主题上的想法非常相似”（Allen 1994, 37）。虽然这也是事实，即熊彼特 (1969, 143–90) 在 1905 年和 1906 年参加了庞巴维克著名的研讨班，并在后来以热烈的话语颂赞他为伟大的老师和大师，但熊彼特本人在他的著作中认定了瓦尔拉斯和维塞尔第一本书是“【他】最亲近的两位作者”（Machlup 1978, 462）。《理论经济学的性质与要义》（*Das Wesen und der Hauptinhalt der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这本书于 1908 年出版，试图解释和捍卫模型的使用，或熊彼特所说的“模式”，“静态经济”——所有经济量都存在于不变的、相互确定的一般均衡中——是纯粹经济分析的主要工具。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也在这本书中提出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概念，该概念与奥地利经济学派密切相关（Swedberg 1991, 26）。

《性质》立即将熊彼特推向了欧洲大陆经济理论家的前列，确立了他作为第三代奥地利学派的杰出成员。维塞尔对这本书进行了漫长而尊重的评论，部分评论是高度赞扬的。维塞尔的主要反对意见是错误的，即熊彼特拒绝将“心

¹⁰ 熊彼特引述于 Hayek (1992, 120)。哈耶克类似地写道，“在从门格尔那里得到最初的促进因素之后，【维塞尔】非常追求自己的方式”（第 49 页）。

理学”作为边际效用理论的基础。¹¹尽管如此，维塞尔认为这本书是一流的——即便有些早熟的——头脑的成就。因此，维塞尔写道

读者随处都可以认出受过丰富多样的训练的头脑，它对当时所有的知识潮流都是开放的。……几年前才开始研究经济学的【熊彼特】，或许有理由自豪地声称这本书不是为初学者写的，而是假定读者对我们的科学状况有相当详细的了解。（引自 Allen 1994, 83-84）

瓦尔拉斯也对这本书印象深刻，他写信给一位同事说这本书是一部“非常悦目和重要的作品”（Swedberg 1991, 30）。在美国，当时美国经济学家的元老克拉克在《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中赞许地评价了本书，并得出结论说：“这项工作既具有批判性又具有建设性，并且在各个方面都对经济科学的进步做出贡献”（引自 Allen 1994, 84）。

与他同时代的杰出人物相比，庞巴维克对《性质》没有说什么好话，因为他正确地认识到其理论方法是多么深刻地反门格尔主义。然而，他也显然认为熊彼特是一位杰出的经济理论家。在一个典型的尖锐脚注中，庞巴维克对熊彼特在《性质》中令人震惊的尝试——从经济理论中根除“因果”和“解释”的概念并用“函数”和“描述”的概念取而代之——进行了毁灭性的批评。”（Böhm-Bawerk 1959, vol. 3, 228–29）。然而，庞巴维克软化了他的批评，最后开玩笑地提到了“一位杰出的经济理论家”，他“允许自己被误导，因为他使用了数学的函数概念，因此没有意识到循环论证的危险。”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庞巴维克的调解，熊彼特在 1911 年 28 岁时成为著名的格拉茨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也是帝国最年轻的教授之一（Allen 1994, 101–02, 117–22; Stolper 1994, 6）。

庞巴维克对熊彼特的奇怪矛盾的态度——他蔑视他的工作，但尊重他的能力——在他写给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的信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 1912 年 7 月 9 日的一封信中，庞巴维克写道：

熊彼特也很年轻。当然，他既【原文如此】不可能掌握他冒险解决的宏伟事业【《性质》】。但我认为他非常有才华。关于他的第二本书（*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1912¹²），您可能会更加震惊。他发展了他的利息理论，而我认为它是完全错误的。（Hennings 1997, 269）

事实上，庞巴维克对熊彼特的利息理论进行了 60 页的严厉批评，并且在熊彼特 40 页的回复之后，在 20 页的反驳中重新发起了攻击（Swedberg 1991, 39）。在 1913 年 4 月写的一封信中，庞巴维克提到了“熊彼特的聪明但不切实际的幻想”（Hennings 1997, 272）。但在几个月后（即 1913 年 9 月）的通信中，庞巴

¹¹ 但维塞尔并不反对熊彼特的瓦尔拉斯主义一般均衡方法本身。正如 Stolper (1994, 9) 所说，“对于均衡理论中心理假设的必要性，维塞尔的方法论观点与熊彼特不同。”

¹² 翻译成英文：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1969).

维克再次歌颂熊彼特的才华，同时斥责他的工作肤浅：“对于我们的年轻经济学家，我也不同意。我认为熊彼特是其中最具有天赋的。如果他能找到从他目前的草率通往扎实、细致的研究的道路，他就能以他的能力为科学做出重要贡献”（273）。

在这一点上，对比庞巴维克对待熊彼特的方式和在给维克塞尔的信中米塞斯所受到的方式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熊彼特被亲切地描绘成一个才华横溢的——尽管喧闹而任性——顽童，而庞巴维克对米塞斯的提及并没有表现出对他能力的丝毫个人尊重或欣赏，尽管米塞斯一直是他的常客。研讨班七年。例如，在1912年8月12日的一封信中，庞巴维克请求维克塞尔评论米塞斯的《货币与信用理论》，并指出：

您可能最近还收到了一位年轻的维也纳学者冯·米塞斯博士撰写的关于货币理论的书。米塞斯是我自己和维塞尔教授的学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愿意为他的所有观点负责。我自己也刚开始读他的书，对其内容还不熟悉。（Hennings 1997, 270）

类似地，在接下来的20个月里庞巴维克所写的三封信中（信中提到了维克塞尔对米塞斯的书的评论），没有任何关于米塞斯的贡献或能力的正面评价（Hennings 1997, 271, 274, 275）。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即使是庞巴维克，尽管他强烈反对熊彼特的价格理论方法，但他仍然认为他是第三代奥地利经济学家中最有前途的。

当熊彼特被他的老师维塞尔和庞巴维克誉为他们最杰出的学生并获得奥匈帝国最年轻的正教授的地位时，他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909）。当这本书在1911年问世时，受到了广泛好评，几乎立即在国际经济学家界树立了声誉。根据他的一位传记作者的说法：

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熊彼特的发展著作几乎一夜之间让他在严肃的经济学家中享誉全球。虽然他的第一本书提醒了学界一颗新星的冉冉升起，但第二本书巩固了他作为经济学神童的地位，并认定他是最杰出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理论家。（Allen 1994, 110）

熊彼特的名声远播。因此，例如，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尼古拉·布哈林（Nicolai Bukharin, 1972, 56）在1917年对奥地利经济理论的有影响力的批判中将熊彼特描述为“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相比之下，布哈林在脚注中将米塞斯称为“奥地利学派的最新倡导者之一”和“货币理论专家”（198，注释100）时，语气几乎不屑一顾。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代表了奥地利学派在其诞生国的分水岭十年。身体虚弱的庞巴维克虽然仍然是一位有影响力的老师，但已经无法从事纯理论方面的原创工作，而门格尔已于1903年退出积极的教学和出版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熊彼特两本书的出版引发了一场强大的运动——沿着（文字）瓦尔

拉斯主义一般均衡分析的路线重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核心。维塞尔 1914 年的《社会经济理论》（*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的出版为这一运动增添了动力。由于维塞尔的书——后来被翻译成英文版《社会经济学》（*Social Economics*, 1967）——是奥地利学派的第一部综合性经济学论文，这意味着纯理论领域现在几乎完全被该学派的一般均衡派系所主导。

这一事态的重要结果是，当奥地利学派的第四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后进入维也纳大学时，其成员不可避免地会从维塞尔和熊彼特的作品中获得理论经验。用哈耶克的话来说，维塞尔是学校的“大领主”，也是大学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教授，讲授主要的经济学理论系列直到 1922 年——尽管他继续担任名誉教授直到 1925 年（Hayek 1992, 22, 123–24）。维塞尔当然是哈耶克的“受人尊敬的老师”，并且哈耶克一直认为自己是“维塞尔传统”而非庞巴维克（和米塞斯）传统的追随者。¹³但维塞尔也是马赫卢普的“第一位主要老师”，并且马赫卢普参加了两次他的为期一年的理论课程（Ebeling and Salerno 1980, 1）。哈伯勒也参加了维塞尔的课程，后来跟随维塞尔的追随者汉斯·迈耶学习，后者于 1922 年接任了维塞尔的教席。¹⁴

由于维塞尔的理论讲座紧密地遵循了《社会经济学》——他要么在“阅读”这本书，要么“或多或少地将其熟记于心”（Ebeling and Salerno 1979, 1; Hayek 1992, 22），第四代成员认为维塞尔的论文是奥地利学派的主要理论表达也就不足为奇了。哈耶克在 1926 年写道：“《社会经济理论》不仅为现代主观主义学派提出的经济理论提供了唯一一致的处理，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也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理论所取得的最伟大的综合”（119）。1927 年，哈耶克的同学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热情洋溢地称赞这本书为“一部已成为奥地利学派理论最重要的陈述的著作”和“由一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撰写的最伟大的系统性论文，其中分析了边际效用原则的所有后果。”Morgenstern (1976a, 482–83) 还将其描述为“标志着经济理论发展的一个时代的普遍有趣的书籍之一”。

然而，与维塞尔的论文同样重要的是，在第四代经济理论家的形成期，熊彼特的第一本书《性质》（在书中他捍卫了一般均衡模型作为纯经济理论的核心概念）似乎对正在崭露头角的他们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哈耶克在 1980 年写作时提到了“他出色的第一本书”，并认为这本书中的思想“对于理解经济理论的发展肯定足够重要。事实上，熊彼特对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做出了贡献，这种传统具有足够的原创性，可以提供给更广泛的公众”（Hayek 1962, 161）。哈耶克还透露，“当然，我们【第四代的】所有人都很熟悉【熊彼特的】两本战的书和他关于货币的论文”（第 34 页）。在谈到《性质》及其对第四代的巨大影响时，Morgenstern (1976b, 490) 回忆说

¹³ 哈耶克明确区分了“奥地利学派的两个原始分支”，即庞巴维克主义和维塞尔主义，并将自己描述为后者的追随者（Hayek 1983, 17–18; 1992, 108–09, 157）。哈耶克还谈到米塞斯是“延续了庞巴维克的传统”，而汉斯·迈耶则是“延续了维塞尔的传统”（51）。

¹⁴ Ebeling and Salerno (1979, 1)。奇怪的是，虽然哈伯勒记得维塞尔是“一位出色的讲师”，但马赫卢普将维塞尔的讲座描述为“非常沉闷”，并承认“很难集中注意力”，这就是他第二年重复这门课程的原因。

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很久，这部作品在维也纳还被人们津津乐道地阅读，其年轻的新鲜感和活力吸引了年轻的学生。我自己记得当我第一次接触到它时，它给了我什么样的启示，并且像我这一代的许多其他人一样，我决心阅读熊彼特写过和会写的所有东西。

Haberler (1993, 22) 将《性质》描述为熊彼特的“第一本伟大的书”。

马赫卢普也对熊彼特印象深刻。他感叹熊彼特被“不公正地”排除在奥地利学派的成员之外，“因为他钦佩洛桑数学学派”（Machlup 1981, 21）。事实上，他接受了对纯理论的目的和方法的熊彼特主义看法。在一篇研究熊彼特的经济方法论的文章（本文频繁且赞许地引用《性质》）中，Machlup (1978, 462) 将一种“对一般认识论和科学方法的卓越理解”归因于熊彼特。在他自己关于方法论的大量著作中，马赫卢普显然采用了他在本文中归因于熊彼特的“方法论宽容”的立场（463）。这一立场归结为两个主张：首先，对复杂经济现实的全面解释需要理论分析，也同样需要历史和统计；但是，第二，用马赫卢普的话说（466），“它是经济理论，它在其‘模式’或‘模型’及其‘定理’中定义和描述（或构建）相关关系。”¹⁵虽然这样的部分均衡和一般均衡模型确实是武断的构建，并且在逻辑上先于现实事实，但它们不仅仅是“先验推测”，因为它们是“根据事实设计的”。在马赫卢普看来，熊彼特的如下陈述总结了熊彼特方法论立场的“决定性点”：“一方面，我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武断的**，它的系统、严谨和准确是基于此的；另一方面，它**适应**现象并受其**制约**，仅这一点就赋予了它内容和意义”（467）。不用说，马赫卢普的方法论方法——它将武断的模型表达描述为理论研究的核心关注点——描述了一种对门格尔的因果现实范式的重大背离。

但是，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传统在 20 世纪 20 年代是怎样的呢？门格尔的《原理》难道不是奥地利学派的指路明灯吗？米塞斯不是庞巴维克的长期学生，现在教大学研讨班并举办自己的私人研讨班吗？关于门格尔在这一时期的直接影响，虽然他还活着，但他对第四代来说“更像是神话而不是现实”，“特别是因为他的书已经变得非常稀有，几乎无法获得，因为副本甚至从图书馆消失了”（Allen 1994, 22）。尽管米塞斯确实是该大学的一名受欢迎的讲师，但他作为一名无薪的私人讲师讲课，并且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在教师的声望上几乎无法与维塞尔或作为纯理论家的熊彼特相媲美。此外，米塞斯的大学课程是一个高级研讨班，反映了米塞斯的研究兴趣，例如货币和信用理论，而不是专注于价值和价格理论（Haberler 1981, 50-51）。虽然哈伯勒和马赫

¹⁵ 在本段中，“图式”和“模型”这两个词是指熊彼特应用于部分均衡，尤其是一般均衡结构的术语。用最近的传记作者 Robert Loring Allen (1994, 77) 的话来说：

对《性质》中的熊彼特来说……经济模型是经济理论家的主要表达和操作工具。他更喜欢称它为图式（schema），或者有时称其为 schemata。在他的书中，他使用了部分和一般均衡模型。……熊彼特主要写的模型，也是熊彼特在静态经济理论中所有工作的焦点模型，是循环流动模型或静止状态下的一般均衡经济。它是瓦尔拉斯最初以数学形式发展的模型的一种变体。

卢普确实都参加了米塞斯的大学研讨班，但哈耶克在大学期间从未参加过米塞斯的正式课程，并且直到他已经获得学位后才真正见到他（Haberler 1981, 50–51, Ebeling and Salerno 1980, 1）。¹⁶

米塞斯令人兴奋和有影响力的私人研讨班不那么关注纯粹的理论，而是涉及货币、商业周期和经济政策等主题，而且通常范围远远超出经济学，还涉及科学哲学和社会学。此外，第四代成员只有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才被邀请参加这个研讨班（Haberler 1981, 51; Ebeling and Salerno 1980, 1）。由于这些原因，研讨班不太可能有助于改变他们从维塞尔和熊彼特那里吸收的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事实上，在他们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的著作中，很明显，马赫卢普、摩根斯坦和哈伯勒都接受了这个模型，或者用熊彼特的话说，一般均衡的“模式”是经济理论的核心。

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至 1933 年的早期工作中，哈耶克也将一般均衡理论视为经济理论的核心。例如，在 1929 年以德文出版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Geldtheorie und Konjunkturtheorie*）中，哈耶克明确指出，一个成功的商业周期理论必须在逻辑上与“均衡理论”的“基本命题”相结合。并且，根据均衡理论，哈耶克（1966, 28–29, 42, n. 2）明确地理解了“主要地……所有经济量一般的相互依存的现代理论——洛桑理论经济学学派对其进行了最完美的表达。”的确，1933 年之后，哈耶克竭力“打破瓦尔拉斯盒子”¹⁷，试图通过将一般均衡理论扩展到对未来的预期和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知识分工的范围内，从而使其动态化。¹⁸但是即使在他最具创造性的著作中，即 1937 年出版的《经济学与知识》中，他仍然坚持这样一种信念，即可以用没有时间的一般均衡方程表示的“纯粹的选择逻辑”在经济理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Hayek 1972, 33–56）。到 1945 年，随着他发表名篇《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哈耶克彻底放弃了使一般均衡理论动态化的棘手项目。相反，他将注意力集中在知识的人际分散问题上，并在假设现实世界的价格总是接近其一般均衡值的同时，认为“任何商品都有一个价格这一事实……带来了这一解决方案，该方案（这只在概念上是可能的）可能是由一个拥有所有信息的单一头脑得出的，而这些信息实际上分散在参与该过程的所有人员中”（86）。¹⁹所以哈耶克，就和他在维也纳受训的同伴一样，永远无法摆脱他年轻时学过的一般均衡框架。

当然，没有人会否认米塞斯对第四代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很大，但他的影响主要是作为货币理论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在 1912 年发表了《货币与信用理论》（*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之后，当哈耶克和他的同伴进入大学时，米塞斯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奥地利学派——并且可以说是大陆经济学家中——杰出的货币理论家的地位。²⁰然而，《社会主义》（*Die*

¹⁶ 正如哈耶克（1994, 57, 68）所回忆的那样，“我是在获得学位后才真正遇到米塞斯的。……我相信，当我还是一名普通学生的时候，我只听过一次他的普通讲座，而且很不喜欢他。”

¹⁷ Murray Rothbard（1987, 97–108）用这个短语来描述熊彼特和阿尔文·汉森使他们固有静态的理论体系动态化的尝试。

¹⁸ Meghnad Desai（1994, 25–50）很好地讲述了哈耶克的——最终徒劳的——斗争的故事。

¹⁹ 关于后期哈耶克和一些当前的哈耶克主义者作为“接近均衡”理论家的特征和批评，参见 Salerno（1993, 127–28; 1994, 116–23）。

²⁰ Hayek（1992, 127）将这本书描述为“多年来在该主题上最深刻、最令人满意的著作”。

Gemeinwirtschaft) 的出版“会给【第四代】留下最深刻的印象”(Hayek 1992, 133)。尽管它确实彻底改变了哈耶克及其同伴的政治经济世界观,但并没有在纯理论层面挑战他们。直到 1928 年,米塞斯开始发表一系列方法论文——收集在 1933 年的《经济学中的认识论问题》(*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中——米塞斯才开始被承认为一位像熊彼特一样的一般理论家和系统构建者。²¹然而,即使在这些年里,米塞斯圈子的成员也无法理解米塞斯最终在他 1940 年的论文《国民经济》(*Nationalökonomie*)中详述的重构的门格尔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细节。²²

马歇尔主义经济学的兴起

这将我们带到了第二个破坏门格尔主义价格理论方法的因素:1890 年之后,马歇尔主义经济学在英语国家迅速崛起。随着庞巴维克的沉默和威克斯蒂德(一个没有学术基础且学术兴趣广泛的兼职经济学家)的出现,马歇尔主义部分均衡经济学在 20 世纪 20 年代席卷了英国的这个领域。这使得在莱昂内尔·罗宾斯(后来的勋爵)领导下的伦敦政经学院成为战后英国唯一的奥地利-威克斯蒂德主义经济学前哨。

经济学家威廉·斯马特(William Smart)体现了英国经济学界马歇尔主义转变的速度和彻底性。1891 年,即马歇尔的《原理》第一版出版后的第二年,斯马特出版了一本小书《价值理论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Value*, 1966),它清晰而高度同情地为讲英语的经济学家介绍了对奥地利学派价值理论。在 19 年后出版的第二版中,斯马特添加了一篇附录,其中包括他的大学讲座“价值理论:需求侧”的总结,以表明他对奥地利学派学说的更成熟的态度。正如标题所示,本附录旨在表明奥地利学派价值理论仅涉及价格决定的需求方面。在本版的前言(viii)中,斯马特告诉他的读者,这份摘要旨在“与塑造现代经济思想的经典著作,马歇尔教授的《原理》的第三卷一起学习”。

在美国,达文波特独特的个性和写作风格以及他与费特之间产生的深厚的个人仇恨阻碍了奥地利-美国学派的发展,²³它未能在其第二代学生中培养出有影响力的思想家。²⁴因此,在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克拉克、费特和达文波特

²¹ 根据 Hayek (同上, 147) 的说法:

当这些文章首次发表时,它们标志着作者的转变,当时主要以货币和信用理论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性分析而闻名,从狭义的经济学家转变为一般的社会理论家和哲学家。

²² 正如哈耶克就《认识论问题》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在本书中的作用主要是说明任何社会理论科学所提出的问题”(同上, 147–48)。

²³ 关于达文波特的怪癖和他与费特的关系,参见 Dorfman (1969, 375–90)。在他最近发表的关于经济思想史的演讲中, Lionel Robbins (1998, 278) 将达文波特的一本书描述为“一本古怪而博学的著作。”达文波特和费特之间的仇恨在他们对彼此论文的评论中显而易见 (Fetter 1916, 550–65; 1916, 596–605; and Davenport 1916, 313–63)。

²⁴ 该学派的一些年轻一代继续编写继承门格尔主义传统的战后教科书。例如,纽约大学的约翰·罗斯科·特纳 (John Roscoe Turner) 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费特的指导下撰写了他的博士论文,并在他的著作前言 (1919, iii–vi) 中表达了对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前同事达文波特的“深深的人情债”。Arthur L. Faubel 是费特和特纳的学生,并且深受达文波特的“著作和学说”的影响

的辉煌职业生涯接近尾声，不再为纯理论做出贡献，该学派对美国经济学主流的影响力急剧下降，把美国的高等理论领域完全留给了马歇尔主义的统治。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之间最畅销的三本经济学教科书是理查德·T. 伊利（Richard T. Ely，与三位合作者）、弗兰克·W. 陶西格（Frank W. Taussig）和亨利·R. 西格尔（Henry R. Seager）撰写的，尽管达文波特和费特的战前论文保持在前十一名（Dorfman 1969, 211）。尽管结合了一些奥地利学派的见解，但伊利等人和西格尔的文本阐述了直截了当的马歇尔主义价格理论，而陶西格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基础上建立了他最初的理论大厦，并被约瑟夫·熊彼特敏锐地总结为“美国马歇尔”

（Schumpeter 1969, 220; Ely et al. 1928, 143–79; Seager 1908, 81–106; 和 Taussig 1928, 109–220）。哈耶克于 1923 年访问了美国，对奥地利-美国学派价格理论家的突然垮台感到震惊和沮丧。回顾与美国经济学界的早期个人接触，哈耶克写道：

我必须承认，从我主要的理论兴趣来看，美国经济学的第一印象令人失望。我很快发现，对我来说家喻户晓的伟大名字被我的美国同时代人——他们的作品并没有比我已经知道的更进一步——视为过时的人。（Hayek 1992, 35）

在德国，反理论的德国历史学派统治的漫漫长夜即将结束，但一战后重新唤醒德国经济学家理论好奇心的书既不是马歇尔的《原理》，也不是门格尔的《原理》，而是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的《社会经济理论》（*Theory of Social Economy*, 1932），该书提供了对瓦尔拉斯主义价格理论的文字演绎。²⁵然而，在罗曼语国家，新生的门格尔主义学派被复兴的英国古典主义和温和的德国历史主义的独特本土融合所排斥。

在法国，法国自由主义学派的领袖保罗·勒罗伊-博利厄（Paul Leroy-Beaulieu）和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k）热切地接受了门格尔主义的方法。这些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和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的学说后裔认为，门格尔从人的需求的事实开始对价格的因果分析是萨伊发起的法国主观价值传统的自然发展（Leroy-Beaulieu 1910, vol. 1, 83–114; vol. 3, 15–94; Block 1897, 129–85）。不幸的是，自本世纪初以来完全主导法国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派在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走下坡路，原因是法国的高等教育进行了彻底的制度改革，在所有法学院均设立了政治经济学教席。大学章程确保这些教席将由法学家和律师担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性情和训练上都同情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和政策规定，并从根本上反对自由主义学派的演

（Faubel 1923, v-ix）。也许这一传统的最后一本教科书是费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同事 Archibald McDonald McIsaac 和 James Gerald Smith 于 1938 年编写的。虽然此时它的价格理论反映了马歇尔主义不完全竞争革命的广泛影响，但它关于分配理论和经济均衡的章节是直截了当的费特主义学说（McIsaac and Smith, 1938, 294–391）。

²⁵ 正如米塞斯所写，“十年来对理论研究的忽视导致了一个显著的结果，即德国公众必须向瑞典人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寻求对经济生活问题的原则性解释”（Mises 1996, 52）。与此类似，Hayek (1992, 33) 评论说：“瓦尔拉斯的【卡塞尔】简化版在德国重新引起了人们对经济理论的兴趣。”

绎方法和核心的自由放任政策计划。²⁶这一结果对策划了机构政变的法国政府来说并非完全不合意。因此，几乎在一夜之间，一个自称的“新”学派在查尔斯·纪德（Charles Gide）的领导下生机勃勃，并很快成为法国经济学的新正统派。纪德和新学派“经济学家”对发展纯粹的理论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他们更愿意重新讨论过时的和以前驳斥过的历史主义对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同时徒劳地努力想出对这两种学说的适度综合。直到1907年，法学院还没有开设正式的经济理论课程，尽管他们几乎完全垄断了经济学的学术教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自由主义学派已成为历史，随之而去的是法国经济学进行门格尔主义复兴的任何机会。²⁷到20世纪20年代，在法国，除了一小群瓦尔拉斯主义者之外，纯经济理论被认为是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历史主义的虚弱和缺乏想象力的混合，其中加入了大量兑水的边际效用理论和马歇尔主义的部分均衡分析。

28

门格尔主义的方法在意大利的表现要好一些，那里在萨伊-巴斯蒂亚传统中也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学派，由弗朗切斯科·费拉拉（Francesco Ferrara）领导。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尤其是奥古斯托·格拉齐亚尼（Augusto Graziani）和乌戈·马佐拉（Ugo Mazzola），很早就开始吸收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启示，从1886年到1890年，“奥地利学派是意大利经济学家中最有影响力的”。1890年，包括马佐拉和杰沃尼亚·马菲奥·潘塔莱奥尼（Jevonian Maffeo Pantaleoni）在内的三位边际主义者担任意大利主要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家杂志》（*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的联合主编，“‘边际主义-自由主义者’的大军……突然变得越来越多”（Barucci 1973, 264–65）。然而，古典经济学和温和的德国历史主义已经在意大利经济思想中扎下了根，使大多数意大利经济学家倾向于折衷主义，并阻止了门格尔主义方法的这些早期种子充分开花。刘易斯·H. 哈尼（Lewis H. Haney）很好地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经济思想的混乱特征：到20世纪00年代初期，意大利出现了“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自由主义折衷主义。……很快，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就加入了，格拉齐亚尼表现出色。但即使是边际效用理论家也做了一些修改，更接近古典理论，因此与其他群体的融合变得不那么困难”（Haney 1949, 844）。²⁹

哈耶克和伦敦政经学院的经济学转型

到1930年，欧洲仍然有一个看似坚不可摧的门格尔主义经济学学术据点：由罗宾斯领导的伦敦政经学院经济系。但欧洲其他地方已经发生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将迅速从根本上改变伦敦政经学院经济学的特征。

²⁶ 自由学派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但被忽视的影响。参见 Salerno (1988, 113–56)。

²⁷ 关于导致“新”学派兴起和自由学派灭亡的法国事件，参见 Alcouffe (1989, 313–44); Rowe (1892, 62–85); Gide (1907, 192–212; 1890, 603–35); 和 Haney (1949, 846–59)。

²⁸ 例如，参见 Gide (1924)。这部作品几乎从1883年首次出版时起就成为法国的主要教科书。本译本基于第23版法文版。英国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早期支持者詹姆斯·博纳尔（James Bonar）将纪德著作的早期英文译本的定位描述为“如果我们用演化和社会联合（‘团结’）代替终极性和个人主义，基本上就是……‘古典学派’。古典学派的理论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新建筑的基础”（Bonar 1900, iv）。

²⁹ 关于这一时期意大利经济思想的发展，另见 Rabbeno (1891, 439–73); Loria (1891, 203–24); 和 Einaudi (1955, 7–25)。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奥地利学派开始在奥地利逐渐消失，因为国外更具吸引力的前景或国家社会主义者德奥合并的威胁驱使主要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移居英国（哈耶克和罗森斯坦-罗丹）、美国（马赫洛普、哈伯勒和摩根斯坦）和瑞士（米塞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奥地利学派大迁徙是导致门格尔传统垮台（尤其是在英国）的第三个因素。因为正是在哈耶克的影响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尤其是约翰·希克斯）开始将由帕累托重新阐述的瓦尔拉斯主义一般均衡理论介绍给英美经济学家。

因格拉（Ingrao）和伊斯雷尔（Israel）敏锐地描述了哈耶克在早期发展英美版本的一般均衡理论中的关键作用：

让哈耶克着迷的问题是瓦尔拉斯和帕累托尚未解决的问题：构建对周期性波动的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可能性，同时不仅保持均衡理论的核心，而且实际上将其作为起点。……在他的伦敦讲座中……哈耶克正是从一般市场均衡的概念出发，并宣称其在经济分析中关键的重要性。……尽管哈耶克没有提供其理论的任何形式化，但他的均衡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建议，这些建议将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文献中得到采纳。跨期均衡的概念——由阿罗和德布鲁用公理化的术语精确定义——形成自他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著作。……对《价值与资本》的内容的更详细阐述的最佳介绍，也许是希克斯自己的概述——关于在他的研究项目和哈耶克的研究项目之间出现的分歧。

（Ingrao and Israel 1990, 232–34）

尽管希克斯在遇到哈耶克之前就读过帕累托，但他肯定哈耶克的教学促使他“再次从帕累托开始”。关于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从事的工作并在《价值和资本》中达到顶峰，Hicks (1983, 359) 透露：“我不是从凯恩斯开始的；我是从帕累托和哈耶克开始的。” Hayek (1992, 53–54) 本人认为《价值与资本》中关于边际替代率和无差异曲线的价值理论分析是“奥地利学派传统半个多世纪讨论的终极陈述。”³⁰

然而，相比哈耶克对希克斯这位特殊且不拘一格的理论家的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哈耶克与希克斯的合作对罗宾斯——伦敦政经学院经济学的核心和灵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7 年至 1934 年间，罗宾斯撰写了一系列出色的论文，阐述和应用因果-现实主义价格理论并批评马歇尔主义部分均衡经济学。³¹此外，他于 1932 年首次发表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清楚地表明了作者对米塞斯和维克斯蒂德的作品“特别感激”，同时有力地论证了经济理论确实是“基于现实的”，正如门格尔最初声称的那样（Robbins 1969, xv–xvi）。罗宾斯的书很快就成功地向大多数业内人士证明，门格尔阐述经济理论的方法既合情合理又现实。正如 Robbins (1969, 78) 所描述的这种方法：

³⁰ 此外，在评价 20 世纪 30 年代在伦敦政经学院工作的经济学家时，哈耶克称希克斯为“超级智慧”、“出色的理论家”和“无疑……我们拥有的最好的头脑”（Hayek 1994, 87）。

³¹ 有关罗宾斯早期微观经济学论文的详细讨论，请参阅 O'Brien (1988, 87–105)。

与所有科学理论一样，经济理论的命题显然是从一系列假定（postulates）中推导出来的。这些假定的主要部分是所有假设（assumptions），它们以某种方式涉及简单且无可争辩的经验事实，这些事实与作为我们科学主题的财货稀缺性在现实世界中实际表现出来的方式有关。³²

然而，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罗宾斯开始受到哈耶克和希克斯的影响，混淆了动态的门格尔-威克斯蒂德价格分析和作为经济理论本质的瓦尔拉斯主义纯选择逻辑。³³例如，在其 1934–35 年期间开设的“经济分析的一般原理”课程的教学大纲中，罗宾斯将庞巴维克、威克斯蒂德、费特、克拉克和达文波特的论文和卡塞尔、帕累托以及后者的追随者恩里科·巴罗内（Enrico Barone）的论文放在“一般理论中的现代著作”标题下。罗宾斯在教学大纲的一个启示性注释中写道：“讨论的性质将是非数学的。希望见证相同问题的数学处理的学生应该参加第 66 号课程（数理经济学导论）”（McCormick 1992, 1–32）。显然，对于罗宾斯来说，在因果现实方法和机械的一般均衡方法之间的选择现在只是一个品味问题。罗宾斯 1938–39 年的教学大纲证明了他对门格尔主义传统的进一步偏离。在一般理论（“静态”和“比较静态”）的部分中消失的是克拉克、费特和达文波特的伟大的奥地利-美国论文，而帕累托的论文仍然存在，增加了希克斯和艾伦关于“重新思考价值理论”的文章、埃奇沃思

（Edgeworth）的《数学心理学》和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此外，虽然威克斯蒂德的论文被列为预备内容，但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现在被确定为课程的组织性文本。

在 1935 年出版的《性质和意义》第二版中可以找到罗宾斯偏离门格尔主义阵营的其他证据。在这一版中，仍有许多脚注引用了费特、达文波特、威克斯蒂德、米塞斯和里夏德·冯·施特里格尔（Richard von Strigl）的作品，但现在它们有点不协调地与引用帕累托和希克斯作品的脚注共存。显然，在第一版中情况并非如此。正如比较过这两个版本的理查德·M. 艾贝林（Richard M. Ebeling）所解释的那样：

相比 1935 年的第二版（其中对文本的修改以及对脚注引用的删除和添加给人的印象是不同的权威影响了他的想法），第一版中的脚注引用更清楚地表明了“奥地利学派”对罗宾斯思想的强烈影响。（Ebeling 1998, 1, n. 1）

此外，正如罗宾斯在第二版序言中的重要揭示，这些改动是在哈耶克、保罗·N. 罗森斯坦-罗丹和阿尔弗雷德·W. 斯托尼尔（Alfred W. Stonier）的“建议和批评”下做出的。和哈耶克一样，罗森斯坦-罗丹是第四代的成员，也

³² 罗宾斯赋予财货概念在经济理论阐述中的核心作用是典型的门格尔主义的。关于这一点，请参阅 Salerno (1999)。

³³ 罗宾斯曾经断言，伦敦政经学院公认希克斯的“头脑非常出色，……他的影响无处不在”并且“我们很快就习惯于寻求他的帮助来解决分析困惑，并寻求他对我们自己的命题的批评。”此外，罗宾斯指出，希克斯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影响“在他离开后持续了很长时间”，并认为他是“肯定被置于本世纪纯经济学家最高行列的人”（Robbins 1971, 129–30）。

是维塞尔-迈耶圈子的成员（Hennings 1997, 272）。重要的是，在《价值与资本》第一版的序言中，希克斯也特别提到了哈耶克和罗森斯坦-罗丹，与伦敦政经学院的一般均衡理论家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阿巴·勒纳（Abba Lerner）和 R. G. D. 艾伦（R. G. D. Allen）一起，为他自己书中的思想做出了贡献（273）。

这里必须简单说一下社会主义计算辩论，因为它清楚地揭示了像米塞斯这样的门格尔主义价格理论家与像哈耶克和后来的罗宾斯这样的文字一般均衡理论家在方法上的差异。在他们对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批评中，哈耶克和罗宾斯都强调了强调中央计划委员会全面及时地发现解决联立方程组——理应替代企业家的货币计算——所需的广泛知识是不切实际的。但对米塞斯来说，经济总是处于深刻而根本的非均衡之中，因此这些方程与经济计算问题完全无关。此外，不完全知识的问题，特别是由于未来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是一个同样困扰中央计划者和私营企业家的问题。

虽然米塞斯通常会避免与他的社会主义批评同伴进行争论，但在 1938 年发表在一份法国经济学期刊上的一篇文章中，他确实明确指出了自己的立场与哈耶克的立场之间的差异。在论证了可以用数学方程描述的均衡状态是一种纯粹假设的、想象的、无法实现的未来状态，其条件今天永远无法得知，并且“与任何真实的事物都不对应”之后，米塞斯写道：

哈耶克也表明，将描述均衡状态的方程应用于经济计算需要了解消费者未来的估值。但在这一点上，他只看到这些方程在实际应用中的难度增加了，而没有看到它们在经济计算中的应用是一个根本的和不可克服的障碍。我们将社会主义政权设想为一个中央计划的独裁政权（其中只有独裁者的评值是重要的），而不是以按照民主原则组织的共同体的形式存在（其中个体消费者或消费者群体的评值对经济计划来说重要）。独裁者今天也不知道将来情况发生变化时他将如何评值；他无法知道，就像个体消费者无法知道一样。³⁴

现在，虽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对货币、资本和商业周期理论的重要贡献在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继续从伦敦政经学院涌现，其中大部分来自哈耶克本人的笔下，但他们逐渐被这一事实削弱：他们离动态门格尔主义价格理论的根源越来越远。这一不幸趋势的顶峰是哈耶克 1941 年出版的《纯资本理论》，它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成功，正是因为它试图在跨期一般均衡的基础上重建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

门格尔价格理论在其前米塞斯时代的化身中的最后一次喘息实际上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美国。费特在普林斯顿的学生弗农·A. 蒙德（Vernon A. Mund）出版了专著《垄断：历史与理论》（*Monopoly: A History and Theory*, 1933），远远优于琼·罗宾逊和爱德华·张伯伦同时出版的马歇尔主义著作。蒙德明确地将他自己对垄断的分析基于门格尔“对垄断和竞争的新的统一分

³⁴ Mises (1938, 1059)。这段话由 Jörg Guido Hülsmann 和 Joseph T. Salerno 翻译成英文。

析”——他宣称，这“使门格尔的工作对经济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两年后，达文波特去世后出版的作品（1935）从因果-现实主义价格理论的角度对整个马歇尔经济学体系进行了不朽——但风格晦涩——的剖析和批判。最后，在1937年，费特在由沃尔特·E. 斯帕尔（Walter E. Spahr）编辑的《经济原理与问题》（*Economic Principles and Problems*）教科书中贡献了四个原创章节。回头来看，费特85页长的贡献代表了门格尔主义价格理论核心的规范陈述，因为它紧接在米塞斯的重建之前（Fetter 1937 a,b,c,d）。不用说，所有这些作品都在马歇尔主义不完全竞争革命和哈耶克-希克斯重建一般均衡理论的接二连三的浪潮下沉没了。

门格尔主义范式中未解决的问题

导致门格尔主义范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瓦解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并不涉及外部环境，而是其理论方法内部的分析缺陷。这些缺点分两个部分，往往掩盖了因果-现实主义方法的独特性，并导致肤浅——但被广泛接受——地将其特征描述为一般均衡方法的不太严格的文字版本。第一个问题围绕着均衡的概念。门格尔在他对实际市场价格形成的分析中表明了实际可观察到的“静止点”或瞬时交换均衡概念的重要性。然而，由于门格尔的《原理》旨在为他从未写过的一部预期的多卷本论文做总论，他阐述了高阶财货价值归算的一般原则，但没有分析交换经济中生产要素的定价和分配。因此，他不需要长期生产均衡的概念。

现在，门格尔的可实现交换均衡（*realizable exchange equilibrium*）概念完全足以分析实际的即时市场价格的形成，并且仍然是因果-现实主义价格理论的核心分析概念。费特在1910年的著作中着重肯定了“经济均衡的概念……必须被认为存在于所有动态社会中……任何价格，无论是多么短暂或不稳定，都是暂时使以该价格购买和出售、生产和需要的数量达到均衡的价格”（Fetter 1910, 133）。达文波特创造了“移动均衡（*moving equilibrium*）”这个术语来指定货币价格的相互依存系统，这种系统不断地出现在市场上每时每刻的交易中。根据 Davenport (1968, 113–14) 的说法，“价格处于一个巨大的移动均衡中，所有部分都与所有其他部分相关，并与它们密切相互依存。”在每个单独的市场中产生确定价格的实际的（即使是瞬时的）供需方程“假设了……一般财货的一个现有价格体系，以及这些财货以货币形式建立的一种价格关系。”正是在这种有限但至关重要的意义上，当今的门格尔主义者坚持认为市场总是（*always*）处于均衡状态。

然而，对于经济基础数据的给定变化，为了找出支配资源价格和配置结构的完整而耗时的调整的因果关系，一个价格和生产最终均衡的辅助的和纯粹想象的建构是必不可少的。庞巴维克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使用了一个完全调整的、没有变化的经济的假构，来将门格尔的归属理论发展成一个关于在资本使用市场经济中的要素定价的成熟边际生产力理论（Böhm-Bawerk 1959, 248–56）。然而，庞巴维克本人从未明确确定或完全理解这种假构的方法。不幸的是，庞巴维克在方法论上仍然受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影响（门格尔也是如此），错误地认为仅仅是“摩擦障碍”阻止了现实世界的经济立即调整到这种长期均衡状态。虽然注意到“在实际实践中，这种‘摩擦障碍’的数量是无

限的”，但庞巴维克灾难性地承认，如果“达到完美”，那么资源的定价和分配可以以“理想的数学准确性”来确定。更具灾难性的是，庞巴维克认为，诸如边际生产力法则之类的经济法则只有在不受干扰的长期均衡世界中才会“理想地完全有效”（255–56）。因此，庞巴维克和门格尔的方法论——即他们对他们用来制定经济定理的方法的说明——不仅混乱，而且与他们成功制定因果-现实主义价格理论所采用的实际方法不相容。³⁵

约翰·贝茨·克拉克是第一位自觉地识别并尝试全面解释指导门格尔主义理论研究方法的经济学家。³⁶但术语的模糊性和内部的不一致甚至损害了克拉克的富有洞察力和开创性的讨论。克拉克认为，对支配市场经济的因果经济规律进行理论化的出发点是想象他所说的“静止状态”。在这种思想建构中，经济系统的基础数据是不变的，价格和资源配置的模式已经完全适应这些数据，因此，所有产品价格等于它们的平均生产成本，而企业家盈亏是不存在的。Clark (1965, 400) 承认，对这种经济的描述是“完全想象的”，“一个静态的社会是不可能的”。然而，他指出，在我们的推理中使用静止状态是“隔离方法的艰苦卓绝但必要的应用”。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分析因果律或“力量”：“【我们】总是看到这种力量……与其他力量一起作用，但我们必须想象……它独自作用。”克拉克纠正了庞巴维克和门格尔，因此无条件地肯定了借助这种假构推导出的“静态法则”是“尽管如此……仍然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中运作”（30）。事实上，“静态法则支配着一个真实而动态的社会活动”，它们对动态调整过程的影响“不是想象的；它们与地球上的任何事物一样真实”（37, 401）。

因此，克拉克出色而彻底地摆脱了穆勒的有害误解，即经济法则只是“假设的真实”，即在“没有干扰原因”（如不完美的要素流动性或非金钱的行动动机）的情况下真实。不幸的是，克拉克选择了“静态法则”一词来描述经济定理的内容，这为另一个有害的错误打开了大门。因为这些定理不是关于适用于没有时间和变化的静止状态的法则——克拉克自己承认这是“完全想象的”和“不可能的”；相反，它们是关于历史上展现的真实的、动态的市场经济的法则。因此，“静态法则”是一个自相矛盾和令人困惑的误称。经济法则——在其推导中静态的虚构必不可少——是不可改变的**现实法则**，这些法则在不可逆转的时间流动中支配着人的行动和互动；因此，它们在时间和行动都被定义去掉的非实现化的静止状态下没有任何应用。

³⁵ 关于这一点对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批评，参见 Mises (1981, 167–82)。

³⁶ 在他伟大论文的序言中，Clark (1965, viii–ix) 对他的理论与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理论之间的“相似之处和对比”进行了重要评论。在 1890 年写给门格尔的学生罗伯特·祖坎德尔 (Robert Zuckerkandl) 的一封信中，克拉克更加明确地指出了他的思想与奥地利学派思想之间的联系，他写道：“没有什么比完全尊重主要是奥地利学派的杰出思想家更让我高兴的了。他们在这个领域比我更早，他们的分析更深入”（引自 Hayek 1992, 39）。后来本土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当然承认克拉克是他们自己的一员。例如，米塞斯评论说：“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特别是由著名的美国学派的创始人约翰·贝茨·克拉克（Mises 引述于 Greaves 1996, 50）。哈耶克强烈主张“至少有一些第二代或第三代奥地利学派的成员，他们亏欠 J. B. Clark 的几乎与亏欠他们的直接老师的一样多”（Hayek 1992, 39）。最后，费特将克拉克（而不是瓦拉斯）与门格尔和杰文斯一起命名为“最充分代表边际理论的三个创造性来源”（Fetter 1923, 594）。

然而，克拉克讨论的问题不仅仅是语义上的。显然被自己的误导性术语弄糊涂了，他无法抗拒将静态物化，暗示它具有独立且永久的存在——尽管它被与动态现象相关的永无止境的“摩擦和干扰”所困扰。因此，对于克拉克来说，静止状态的存在方式与海洋水平面的存在方式相同，独立于不断翻动其表面的海浪。用克拉克的话来说，

静止状态……应该……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安排，通过现实社会的干扰和变化的群体制度【即竞争性市场经济】表现自己，就像想象中的海平面通过波浪表现自己一样。静态社会……是行动——现实世界在其中进行——的一种形态和形式。……我们可以掌握它的本质现实。

(Clark 1965, 402-03)

根据这一具体化，克拉克将经济定理分为关于“静态力量”和“动态力量”的命题。由于两组力量都在“事实世界”中运作，静态经济理论必须辅以关于经济动态的理论，即“经济摩擦和干扰的科学”（32）。此外，这两组力的作用是不对称的：“在不变的世界中起作用的静态力量不仅在变化的世界中起作用，甚至是其中的主导力量”。因此，尽管存在持续的动态摩擦和干扰，但现实世界的价格、工资率和利率“总是比较接近”由静态力量设定的“自然标准”（30）。

当然，克拉克错误地将静态具体化不应掩盖他在证明所谓的“静态方法”是经济学理论探究的唯一、真正方法方面的辉煌成就。尽管如此，克拉克作为“第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理论家”（Mai 1975, 51）的卓越地位，确保了他令人信服但有缺陷的方法论说明会产生可怕的后果。³⁷就这一次，人们承认了动态现象是次要的，并且，经济理论基本上是一个关于一个几乎存在的静态世界的命题系统，因果-现实主义方法突然表现为一般均衡方法的冗余和不那么严格的版本。而且，如上所述，在哈耶克和希克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向讲英语的经济学家介绍一般均衡经济学之后，即使是伦敦政经学院的昔日支持者也是如此对待它的。

当遇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理论发展时，门格尔主义的方法体现了第二个——甚至更根本性的——缺点。这就是它未能提供一个关于货币价格（因此也就未能提供一个关于货币计算）的理论。即使在其最复杂的变体中，正如在威克斯蒂德、费特和达文波特的论文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易货经济理论。虽然门格尔及其追随者们敏锐地认识到经济计算只能与货币价格一起运作，并且现实的价格理论必须是货币交换经济的理论，但他们无法克服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之间看似不可弥补的分裂。

门格尔本人指出了货币经济和易货经济之间的关键区别，指出通过货币计算促进经济活动的手段和目的的定量比较“即使不是有目的的行动的基础和先

³⁷ 米塞斯本人直到 1933 年才采用克拉克对静态和动态的区分（尽管含义不完全相同），甚至承认“在本科学的当前状态下，不可能确定动态法则在交换学系统中是否可行”（Mises 1981, 108）。

决条件，也具有最重要的实际意义，”而“在易货经济中，经济财富的衡量和经济计算都遇到了麻烦的困难”（Zlabinger 1977, 9–10）。门格尔还通过根据个人对现金余额的欲望提出了对货币需求的开创性解释，在发展一个关于货币价格的理论方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32–40）。庞巴维克也强调经济计算必须是货币计算，并指出“货币提供……不同个体的用别的方法无法比较的需求和情绪的中性公分母”（Böhm-Bawerk 1959, 250）。因此，他对价格的定义总是与货币有关，并且，他不断强调货币价格在将消费者的主观价值从消费品通过资本品升序“归属”到土地和劳动力等原始要素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这种货币归属过程确定的要素价格使企业家能够计算和比较替代生产过程的成本，并根据边际生产力法则分配稀缺的要素。庞巴维克还根据商品的货币价格（*Geldgrenznutzen*）对买方的边际效用来构想其机会成本（Böhm-Bawerk 1962, 51–70）。

基于类似的见解，Wicksteed (1967, vol. 1, 135–41; vol. 2, 575–623, 768–69, 825–26) 和 Davenport (1968, 254–331) 都拒绝了机械的、加总的货币数量理论，并试图在“微观的”因果-现实主义方法框架内发展货币和货币价格理论。尽管他们都在这个目标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威克斯蒂德非常接近于实现它——但他们的最终失败意味着门格尔主义价格理论仍然是一种易货交换理论。现在，在其 1912 年发表的关于货币的论文《货币与信用理论》（*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nlaufmittel*）中，米塞斯的确在整合货币和价值理论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然而，他没有详细说明这种整合对价格理论的影响，而且，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他自己认为这个项目直到 1940 年才完成。

因此，1940 年之前的门格尔主义价格理论家缺乏必要的分析工具来证明这两者，即没有时间和货币的一般均衡方法和不系统的、部分均衡的马歇尔主义方法——尽管有 20 世纪 30 年代的分析技巧展示——都明显地、完全地与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无关。这个问题是解释货币交换如何引发对于动态世界中的合理资源配置至关重要的经济计算过程。

所以，在 1871 年至 1914 年的一段引人注目的发展和影响之后，门格尔主义的价格理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核心学说——停滞不前，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几乎成为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完结篇章。与其说这种方法被拒绝了，不如说——一部分是由于它自身的缺陷——它被令人费解地与竞争方法混为一谈。毫不奇怪，鉴于他在其实现中的核心作用，这种方法的“融合”和奥地利学派在 20 世纪 30 年代事实上的分崩离析被哈耶克在 1968 年赞许地引用为该学派胜利的证据。在谈到整个学派第四代（他本人是其中最杰出的成员）时，哈耶克写道：

但是，如果说第四代在思维方式和兴趣上仍然清楚地显示了维也纳传统，然而，在代表特定学说的意义上，它几乎不再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当一个学派不再存在时，它就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因为它的主要观点已经成为普遍主导思想的一部分。维也纳学派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这样的成功。它的发展确实导致了源自门格尔的思想与【威廉·斯坦利】杰文斯（通过菲利普·H. 威克斯蒂德）、莱昂·瓦尔拉

斯（通过维尔夫雷多·帕累托）的思想，以及尤其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重要思想的融合。(Hayek 1992, 52)

《人的行动》与门格尔主义传统的重生

米塞斯在 1934 年移居瑞士时，一定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种灾难性的状况。作为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eva）的全职领薪教员，米塞斯得到了舒适的安置，他第一次可以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学术研究。米塞斯利用这个机会撰写了《国民经济学》

（*Nationalökonomie*），它是《人的行动》的德语前身和一本旨在复兴门格尔主义方法并将其详细阐述为一个完整而统一的经济理论体系的书籍。³⁸米塞斯高度重视本书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证据是在 1940 年本书出版之前的几年里，他几乎没有写别的。米塞斯以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他从 1934 年到 1939 年的作品相对较少：除了书评、简短的备忘录、报纸和杂志的文章、笔记和序言，只有一篇面向学术读者的实质性文章。³⁹

在回顾他撰写《国民经济学》的目的时，米塞斯毫无疑问地表明，他试图解决他的门格尔主义先行者们尚未解决的两个紧迫问题：均衡建构的地位以及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之间的分歧。关于前者，米塞斯写道：

我试图在我的论文中将静态均衡的概念视为仅仅是工具性的，并利用这种纯粹假设的抽象作为接近理解不断变化的世界的一种手段。许多经济理论家的一个缺点是他们忘记了将这个假设概念引入我们的分析的目的。我们不能没有这个没有变化的世界的概念；但我们只能将其用于研究变化及其后果，即研究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而研究利润和损失。（Mises 1980, 230–31）

关于他将货币纳入门格尔主义理论体系的努力，米塞斯将他的直接灵感确定为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社会主义计算辩论中的反对者。这些经济理论家在一般均衡方法的影响下，提倡用数学方法解决社会主义计算问题。正如米塞斯所说：

他们没有看到第一个挑战：总是由偏爱和割爱⁴⁰（也就是做出不等的评值）构成的经济行动如何转化成相等的评值，以及等式的使用？因此，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荒谬的建议，即用数学交换方程（描绘出一幅消除了人的行动的图景）来代替市场经济中的货币计算。（Mises 1978, 112）

³⁸ 米塞斯表示，他长期以来对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价格理论感到不满，但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他才能够清楚地表达他的反对意见（Mises 1978, 59–60）。

³⁹ 参见 Mises (1993, 41–45)，以了解这些年发表和未发表的著作清单。

⁴⁰ 原文为德语，英语有两个不同的版本，《笔记与回忆》（*Notes and Recollections*）版的译文是“preferring and setting aside”，而《【米塞斯】回忆录》（*Memoirs*）版的译文是“preferring and deferring”。为这两个词找到一个准确的中文翻译颇为不易，但它们所指的大概就是在价值排序中往前放和往后放。我沿用的“偏爱”和“割爱”是本书中文版译者黄华侨博士的译法。——译者注

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货币计算理论（最终建立在货币交换经济的统一理论之上），米塞斯意识到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立场进行明确的反驳。因此，米塞斯透露：

我的《国民经济学》终于让我有机会呈现经济计算问题的全部意义。……正是在我的《国民经济学》第三部分提供的解释中，我的货币理论才得以完成。因此，我完成了 35 年前呈现给我的项目。我将间接交换理论与直接交换理论合并为了一个连贯的人的行动体系。（同上）

因此，《国民经济学》标志着门格尔主义理论方法的顶峰，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重生。因果-现实主义方法现在有了它所需要的伟大的系统性论文，以便明确地将其与价格理论的竞争方法区分开来。当有人比较《国民经济学》和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中实现的一般均衡方法的有影响力的重述（它代表了瓦尔拉斯-帕累托传统与瓦尔拉斯-熊彼特传统的融合）时，门格尔主义方法和瓦尔拉斯主义方法之间根本的、不可调和的差异最终被明确无误地揭示出来。

哈耶克对《国民经济学》的反应表明，米塞斯的门格尔主义经济理论方法与第四代的融合主义者方法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尽管他 1941 年的评论总体上对这部作品表示同情，但哈耶克对这一事实感到困惑——米塞斯并未受到“在他的作品持续期间【即在过去 20 到 30 年】，我们学科的总体演变的影响”，并且，米塞斯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似乎是绝对自主的”。哈耶克的困惑源于他未能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国民经济学》代表米塞斯在有意“自主地”重建一种范式，这种范式无法与哈耶克本人赞同的瓦尔拉斯主义-马歇尔主义融合方向的经济学“总体演变”相协调。哈耶克的预言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即大多数读者主要感兴趣的不会是本书的“核心部分”（即货币计算和交换学部分）。但是，当然，正是这些章节包含了重建的门格尔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实质性内容（Hayek 1992, 150–51）。

1940 年初，随着奥地利学派在《国民经济学》出版的推动下强势卷土重来，灾难袭来。由于欧洲战争与德语市场隔绝，其瑞士出版商倒闭，米塞斯论文的销售和发行也停止了。到 1949 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时，门格尔主义价格理论立即恢复在经济理论主流中的影响力的时机已经过去。战后，由于许多中欧经济学家移居美国，再加上由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 I. Bill）创造出的学费补贴导致美国高等教育学院的巨大扩张，纯理论的领导地位在战后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Barber 1970, 14）。与此同时，美国的知识潮流正在发展，这导致马歇尔主义方法和瓦尔拉斯主义方法合并为不可战胜的正统。

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马歇尔主义价格理论一直主导着美国的教科书文学和本科教学，但到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开始失去一些光彩。到这个时候，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马歇尔主义部分均衡方法（这是不完全竞争革命的基础）的局限性，并且在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的《垄断竞争与一般均衡理论》（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1940)等著作中,试图将其纳入一般均衡理论。然而,与此同时,部分均衡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移植到美国中西部,在那里由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他是从他的马歇尔主义导师陶西格那里学到的——进行了阐述。部分均衡方法——和弗兰克·奈特的完全竞争概念一起——被维纳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吸收。马歇尔、奈特和维纳的正式合并(后来被称之为“芝加哥价格理论”),在1942年出版的乔治·斯蒂格勒的《竞争价格理论》(*The Theory of Competitive Price*)中得到了明确的陈述。斯蒂格勒的教科书(其后续版本的标题为《价格理论》)是大量中间价格理论和微观经济学教科书的先驱和灵感,这些教科书被用来在战后时代向几代美国本科生灌输马歇尔主义部分均衡价格分析。不用说,这些书并没有指导他们的读者解决货币计算的问题,甚至没有提醒它们的存在。⁴¹

有第二个、独立的因素使美国经济学家对马歇尔主义价格理论重新产生了兴趣。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在二战期间担任美国政府政策顾问的经历非常愉快,并渴望在战后继续担任这一角色。鉴于欧洲和日本——面临着苏联迫在眉睫的威胁——的战后重建问题,以及将美国战时经济重新转变为和平时期的问题,对他们的服务当然有着持续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由于大萧条和二战等危机期间政府扩张不可避免的“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美国政府永久性地扩大了对美国经济的干预范围。因此,它现在需要对其和平时期的“经济管理”职能进行科学论证和指导,而经济学家作为政策顾问非常适合执行这些职能。但政策建议意味着对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问题给出合理明确的答案。而对于管理特定的行业、市场和部门,例如反垄断、劳工、农业和国防,部分均衡模型是量身定做的。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学界正在向技术驱动、以期刊为中心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文化发展,部分均衡模型的形式化和测试及其对特定问题的适应是此类研究的基础。⁴²这种文化也激发了人们对一般均衡分析的兴趣,随着1947年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的出版,它在美国经济学界站稳了脚跟。处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问题,以及将该模型应用于国际贸易和福利经济学的文章,很快在期刊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两种研究趋势最终体现在马歇尔主义方法和瓦尔拉斯主义方法的特殊融合上——在斯蒂格勒中间价格理论文本的几乎所有后继者中都可以找到。不用说,在这个形式主义盛行的时代,卡尔·门格尔的因果-现实主义价格理论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

⁴¹ 例如,参见 George Stigler (1965)。“货币”在本书的索引中没有出现一次。在最近的芝加哥式价格理论文本中,我们发现了以下陈述:

尽管价格和价值通常以货币形式给出,但货币与分析无关。……人们经常断言经济学是关于货币的,或者经济学的错误在于它只考虑货币。这几乎与事实相反。虽然货币确实在一些经济学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商业周期分析,但价格理论可以在纯粹的易货经济中得到和解释,而无需提及货币。(Friedman 1990, 100, 102–03)

⁴² 有关这种形式化的证据,请参见 Backhouse (1998, 85–107)。

一本价格理论文集的编辑在 1971 年认识到了这种情况，并对其进行了总结：

杰文斯、门格尔、埃奇沃思、威克斯蒂德、克拉克和费雪可能会因为将现代价格理论归因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莱昂·瓦尔拉斯这两个来源而受到冒犯，但这两位学者对 20 世纪的思想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与马歇尔在解释经济的详细运作方面进行的脚踏实地的努力形成对比的是瓦尔拉斯对一般均衡的宏伟建构。在一本典型的英国或美国价格理论教科书中，十分之九的内容来自马歇尔的著作，一般均衡只在最后一章或附录中引起注意。（Townsend 1971, 57）

只需补充一点，在 20 世纪 30 年代，至少门格尔和威克斯蒂德的幽灵（克拉克一直活到了 1938 年）会感到非常不安。

关于为什么奥地利经济学的影响力似乎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达到国际顶峰，但其影响力如此急剧下降，以至于到 1940 年——当然也就是二战结束时——可以说是完全为零的主要原因，本讨论提出一个修正主义论点。传统观点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被“凯恩斯雪崩”埋葬了。但这只有在我们默认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本质错误地认定为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事实上，庇古和罗伯逊的剑桥周期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理论一起被埋葬了，而马歇尔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不仅幸存了下来，而且一直蓬勃发展至今。同样，芝加哥学派价格理论以及维克塞尔和卡塞尔的一般均衡分析分别经历了费雪的数量论和斯德哥尔摩学派货币“序列分析”的失败。⁴³不是这样的，因果-现实主义价格理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精髓——在其鼎盛时期并非被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英国雷鸣般的爆发突然推翻。相反，它在仍处于不成熟状态时被几乎所有的捍卫者抛弃，多年前在它诞生的土地上就开始被竞争方法悄悄篡夺。

回到米塞斯的成就上，《国民经济学》的写作当时是一次极其孤独的冒险。到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米塞斯在他独自寻求复兴和完善门格尔主义传统的过程中已经不能指望智识上的盟友了。正如哈耶克赞许地指出的那样，当米塞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在日内瓦辛勤工作时，奥地利经济学派实际上已是经济思想史上一个完结的篇章。当他劳动的第一批果实在藤蔓上枯萎——在一个原本已经占位的世界里无人到场——时，米塞斯坚持不懈，并在近十年后将《人的行动》带到了一个充满敌意和不理解的世界。通过点燃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⁴⁴并一直蓬勃发展至今的门格尔主义范式研究的现代复兴，正是这项

⁴³ 在发展他们的序列分析的“动态方法”时，年轻的瑞典人，如 Erik Lindahl、Gunnar Myrdal 和 Erik Lundberg 以维克塞尔和卡塞尔分析“静止状态”的“静态方法”或一般均衡为出发点（Hansson 1982, 18–22）。卡塞尔的一般均衡理论构成了赫克歇尔-俄林国际贸易模型的核心，该模型在二战后引起了极大的兴趣。George Halm 在他广受欢迎的战后教科书中对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阐述包括一份关于卡塞尔的方程组的附录（Caves 1967, 23–57；和 Halm 1960, 320–28）。

⁴⁴ 这里是把罗斯巴德《人，经济与国家》的出版视为了奥地利学派复兴的起点，不同于把 70 年代中期（即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和南罗约顿会议的举办）视为起点的常见观点。——译者注

伟大的工作——不管多不可能——扭转了思想史的进程。但是，对奥地利学派历史这一篇章的描述还没有写完。

参考文献

Alcouffe, Alai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French Universities: 1819–1896.”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1 (Summer).

Allen, Robert Loring. 1994. *Openings Doors: The Life and Work of Joseph Schumpeter. Vol. 1. Europ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Andrews, John K., Jr., ed. 1981. *Homage to Mises: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Hillsdale, Mich.: Hillsdale College Press.

Backhouse, Roger E. 1998.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Economics, 1920–1960: Viewed Through a Survey of Journal Articles.” In *From Interwar Pluralism to Postwar Neoclassicism*, Mary S. Morgan and Malcolm Rutherford, ed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arber, William. 1970. “Postwar Changes in American Graduate Education.” In Coats 1970.

Barucci, Piero. 1973. “The Spring of Marginalism in Italy, 1871–1890.” In Black et al. 1973.

Birner, Jack, and Rudy van Zijp. 1994. *Hayek, Coordination, and Evolution: His Legacy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New York: Routledge.

Black, R.D. Collison, A.W. Coats, and Crauford D.W. Goodwin, eds. 1973. *The Marginal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lock, Maurice. 1897. *Les Progrès de la Science Économique depuis Adam Smith: Révision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Vol. 1. 2nd ed. Paris: Guillaumin et Cie.

Böhm-Bawerk, Eugen von. 1886. “Grundzüge der Theorie des wirtschaftlichen Güterwerthes.”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3:1–82, 477–541.

———. 1959. *Capital and Interest*. Vol. 2. *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 Trans. and edited by George D. Huncke and Hans F. Sennholz. Vol. 3. *Further Essays on Capital and Interest*. Trans. by Hans F. Sennholz.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 1962. “The Ultimate Standard of Value.” In Böhm-Bawerk, *Shorter Classics of Böhm-Bawerk*. Vol. 1. Trans. by C.W. McFarlane.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Bukharin, Nikolai. [1927] 1972. *Economic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Cassel, Gustav. 1932. *The Theory of Social Economy*. Trans. by S.L. Barron. ed. 2nd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Caves, Richard E. 1967. *Trade and Economic Structure: Models and Metho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lark, John Bates. [1899] 1965.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 Theory of Wages, Interest, and Profit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Coats, A.W. 1997. *The Post-1945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conomic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Davenport, Herbert J. 1916. "Fetter's 'Economic Principl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4 (April).

———. 1935. *The Economics of Alfred Marshall*.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13] 1968. *The Economics of Enterprise*.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Desai, Meghnad. "Equilibrium, Expectations, and Knowledge." In Birner and van Zijp, eds. 1994.

Dorfman, Joseph. [1949] 1969a. *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 Vol. 3. 1865–1918; and Vol. 4. 1918–1933.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Ebeling, Richard M. 1998. "The Austrian Theory of Consumption Period Planning: Som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Interwar Period." Presented at the South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Meeting (November).

Ebeling, Richard M., and Joseph T. Salerno. 1979.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Gottfried Haberler." Unpublished Manus.

———. 1980.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Fritz Machlup." *Austrian Economics Newsletter* 3 (Summer).

Einaudi, Luigi. 1955. "Fifty Years of Italian Economic Thought: 1896–1946 Reminiscences." Trans. by E. Henders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s* No. 5.

Ely, Richard T., Thomas S. Adams, Max O. Lorenz, and Allyn Young. 1928. *Outlines of Economics*. 4th ed. New York: Macmillan.

Faubel, Arthur L. 1923.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Fetter, Frank A. 1915. *Economic Principles*. New York: Century.

———. 1916. "Davenport's Competitive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1910. "The Phenomena of Economic Dynamics: Discussion."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roceedings*. 3rd Series. Vol. 11 (April).

———. 1916. "An Appeal to 'The Sober Read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4 (June).

- . 1923. “Value and the Larger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1 (October).
- . 1937a. “Desires, Choice, and Value.” In Spahr, ed. 1937.
- . 1937b. “Markets and Prices.” In Spahr, ed. 1937.
- . 1937c. “Cost-Prices, Product-Prices, and Profits.” In Spahr, ed. 1937.
- . 1937d. “Business Price Practices and Social Price Policies.” In Spahr, ed. 1937.
- Friedman, David D. 1990. *Price Theory: An Intermediate Text*. 2nd ed. Cincinnati, Ohio: Southwestern Publishing.
- Gide, Charles. 1890. “The Economic Schools and the Teach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Franc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5 (December).
- . 1907. “Economic Literature in Fran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conomic Journal* 17 (June).
- . [1891] 1900.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y Edward Percy Jacobsen. Boston: D.C. Heath.
- . 1924.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y Ernest F. Row. New York: D.C. Heath.
- Haberler, Gottfried. 1981. “A Vienna Seminarian Remembers.” In Andrews, ed. 1981.
- . 1993.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 In Hayek, *The Liberal Economic Order*. Vol. 2. Money, Cycles, and Related Themes. Anthony Y.C. Koo, ed.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 Halm, George. 1960. *Economic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2nd. ed. New York: Holt, Rhinehardt and Winston.
- Haney, Lewis H. 1949.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 Critical Account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Theories of the Leading Thinkers in the Leading Nations*. 4th ed. New York: Macmillan.
- Hansson, Björn A. 1982. *The Stockholm Schoo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ynamic Method*. London: Croom Helm.
- Hayek, F.A. 1941.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33] 1966.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 Trans by Nicholas Kaldor and H.M. Croome.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 . [1948] 1972a.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Henry Regnery.
- . 1972b.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In Hayek 1972a.
- . 1972c.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In Hayek 1972a.

———. 1983. “Coping with Ignorance.” In Hayek, *Knowledge, Evolution, and Society*. London: Adam Smith Institute.

———. 1992.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A. Hayek. Vol. 4. *The Fortunes of Liberalism: Essays on Austrian Economics and the Ideal of Freedom*. Peter G. Klein,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4. *Hayek on Hayek: 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 Stephen Kresge and Leif Wenar, e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nnings, Klaus H. 1997. *The Austrian Theory of Value and Capital: Studies in the Life and Work of Eugen von Böhm-Bawerk*.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Hicks, John R. [1946] 1968. *Value and Capital: An Inquiry into Som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Economic Theory*.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3. “The Formation of an Economist.” In Hicks, *Collected Essays on Economic Theory*. Vol. 3. *Classics and Moder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lcombe, Randall G., ed. 1999. *Fifteen Great Austrian Economists*.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Forthcoming 1999.

Howey, Richard S. [1960] 1989. *The Rise of the Marginal Utility School: 1870–188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ngrao, Bruna, and Giorgio Israel. 1990. *The Invisible Hand: Economic Equilibrium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an McGilvray, tran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Kauder, Emil. 1965. *A History of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oria, Achille. 1891. “Economics in Ital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2 (September).

Leroy-Beaulieu, Paul. 1910. *Traité Théorique et Pratique d’Économie Politique*. 4 Vols. 5th ed. Paris: Librairies Félix Alcan et Guillaumin Réunies.

Machlup, Fritz. [1951] 1978. “Joseph Schumpeter’s Economic Methodology.” In Machlup,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1981. “Ludwig von Mises: A Scholar Who Would Not Compromise.” In Andrews, ed. 1981.

Mai, Ludwig H. 1975. *Men and Ideas in Economics: A Dictionary of World Economists Past and Present*. Totowa, N.J.: Littlefield, Adams.

McCormick, B.J. 1992. *Hayek and the Keynesian Avalanch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McIsaac, Archibald McDonald, and James Gerald Smith. 1938.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Analysis*. Boston: Little, Brown.
- Menger, Carl. 1981.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Trans. by James Dingwall.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Mises, Ludwig von. 1938. “Les Équations de L’Économie Mathématique et Le Problème du Calcul Économique en Régime Socialiste.” Trans. by Gaston Leduc. *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
- . 1978.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Trans by Hans F. Sennholz.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 . 1980. “My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Theory.” In Mises, *Planning for Freedom and Sixteen Other Essays and Addresses*. 4th ed.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 . [1934] 1981a.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Trans. by H.E. Batson. Indianapolis, Ind.: Liberty Classics.
- . [1960] 1981b. *The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Trans. by George Reisma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 1993. *Mis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Compiled by Bettina Bien Greaves and Robert W. McGee. Irvington-on-Hudson, N.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 . 1996. “Carl Menger and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In *Austrian Economics: An Anthology*. Bettina Bien Greaves, ed. Irvington-on-Hudson, N.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 . [1949] 1998.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orgenstern, Oskar. 1976a. “Friedrich von Wieser, 1851–1925.” In Morgenstern, *Selected Economic Writings of Oskar Morgenstern*. Andrew Schotter, e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 1976b. “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 In Morgenstern 1976a.
- Mund, Vernon A. 1933. *Monopoly: A History and The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O’Brien, D. 1988. *Lionel Robbi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Rabbeno, Ugo. 1891.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Ital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6 (September).
- Rothbard, Murray N. 1987. “Breaking Out of the Walrasian Box: The Cases of Schumpeter and Hansen.”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1.

Robbins, Lionel. [1935] 1969.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2n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1971.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1998.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The LSE Lectures*. Steven G. Medema and Warren J. Samuels, ed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we, Leo S. 1892. "Instruction in French Universit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struction in Public Law and Economics in the Law Faculti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2 (January).

Salerno, Joseph T. 1988. "The Neglect of the French Liberal School in Anglo-American Economics: A Critique of Received Explanations."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2.

———. 1993. "Mises and Hayek Dehomogenized."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6, no. 2.

———. 1994. Reply to Leland B. Yeager on "Mises and Hayek on Calculation and Knowledg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7, no. 2.

———. 1999. "Carl Menger: The Founder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In Holcombe 1999.

Samuelson, Paul A. [1947] 1976.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Atheneum.

Schumpeter, Joseph A. 1908. *Das Wesen und der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und Humblot.

———. 1969a. *Ten Great Economists: From Marx to Keyn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34] 1969b.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Redvers Opie, tra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ager, Henry Rogers. 1908.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3rd ed. New York: Henry Holt.

Smart, William. [1881] 1966.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Value on the Lines of Menger, Wieser, and Böhm-Bawerk*.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Spahr, Walter E., ed. 1937. *Economic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2 Vols. 3rd ed.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Stigler, George J. 1949.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ories: The Formative Period*. New York: Macmillan.

———. 1965. *The Theory of Price*. 2nd ed. New York: Macmillan.

- Stolper, Wolfgang F. 1994.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The Public Life of a Private M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wedberg, Richard. 1991. *Schumpeter: A Biograp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aussig, F.W. 1928.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2 Vols. 3rd ed. New York: Macmillan. Vol. 1.
- Townsend, Harry, ed. 1971. *Price Theory: Selected Readings*. Baltimore, Maryland: Penguin Books.
- Turner, John Roscoe. 1919.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New York: Charles Schribner's Sons.
- Wicksteed, Philip H. [1932] 1967. *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2 Vols.
- Wieser, Friedrich von. [1927] 1967. *Social Economics*. Trans. by A. Ford Hinrich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 . [1893] 1971. *Natural Value*. Trans. and edited by William Smart.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 Zlabinger, Albert H. 1977. "Abridge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arl Menger's Geld": Chapters 5–14." Prepared for the Carl Menger Symposium at Claremont Men's College.